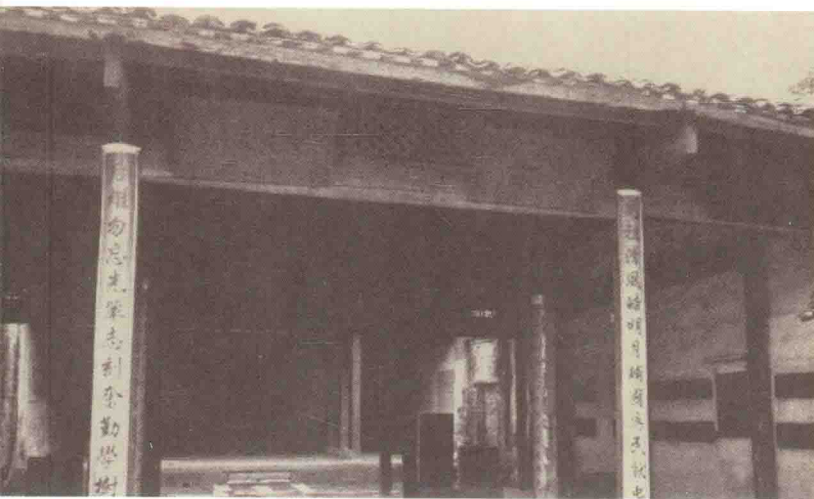




[美] 罗威廉 著
陈乃宣 李兴华 胡 玲 等
赵 刚 孔祥文 审校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救 世

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
精英意识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美] 罗威廉 著

陈乃宣 李兴华 胡 玲 等 译

赵 刚 孔祥文 审校

救 世

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
精英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救世: 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美) 罗威廉著; 陈乃宣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9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ISBN 978-7-300-23264-5

I. ①救… II. ①罗… ②陈… III. ①陈宏谋 (1696—1771)-人物研究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5508 号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美] 罗威廉 著

陈乃宣 李兴华 胡 玲 等 译

赵 刚 孔祥文 审校

Jiushi—Chen Hongmou yu Shiba Shiji Zhongguo de Jingying Yi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40 插页 2

字 数 639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这项研究的部分经费得到古根海姆基金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及美国科技和学术交流委员会（台湾）的赞助。我非常感谢中国许多单位对我工作的关切：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广西师范大学。我也感谢许多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珍藏的丰富的史料，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桂林图书馆、桂林博物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书部分章节早先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清史问题》（《帝制晚期中国》）、《近代中国》、《中国研究》、《清史研究》、由艾尔曼和亚历山大·伍德塞德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与社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以及肯尼斯·莱伯扎尔、林舒弗和欧内斯特主编辑的《中国的建设：经济和文化相互影响》（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7）等杂志和论文集上发表过。这些杂志、论文集编者和出版者允许我再次使用他们曾发表过的章节，这里我表示衷心感谢。

若没有许多好友和同事们的慷慨帮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写成现有的规模。读过本书全部或部分章节并提供批评意见的学者有兰金、曼素恩、狄百瑞、韩书瑞、孔飞力、艾尔曼、柯娇燕、巴德妮、刘广京、欧内斯特·扬、黄宗智、周锡瑞。在准备撰写的过程中，我还得到来自学者们的帮助。他们是盖博坚、周启荣、傅佛果、安·D·伯德威斯特尔、罗伯特·马克斯、程恺礼、包弼德、唐纳德·萨顿、卜正民、宋怡明、王国斌、邓海伦、贾宁、王福明、马钊、王笛、程为坤、葛治平、柯娇燕、蒲池典子、魏爱莲、何伟亚、戴廷杰、伊丽莎白·格罗帕、史华罗、白吉尔、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米华键、史蒂文·萨特、查理德·培尔斯基

和基斯·克莱蒙格。我实地考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还得感谢台北的梁其姿、苏云峰、张朋远、熊秉贞、蒲慕洲、林曼红、黄克武和林思义，北京的王庆成、张芝联、王思治、秦国经、高翔、杨念群、高王凌、赵思禹、吴建雍、彭泽益和成崇德，桂林的张家璠、侯晓南、周良任（音译——译者注）和郭志高。

在此，我还需提到为本书的完成作出特别贡献的几位友人。首先要提出的是我的好朋友魏丕信。他与我一样对这本书的研究对象非常着迷。没有一位学者能像他一样给予我的研究如此大的帮助。他与我在学术领域建立了长期诚挚的友谊，我们分享资料，我们的基本观点也相同。

陈乃光是陈宏谋家族现在的主要人物，也是陈宏谋遗产的主要管理人。我对他表示永远的感谢，谢谢他让我有机会参观陈宏谋在横山的住宅，并感受这位陈家赫赫有名的先人留下的影响。

我的老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穆里尔·贝尔以一种巨大的耐心等待这本书，并给予了我各种方式的支持。

约翰·罗素·伍德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前任主任。在这本书的长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他始终给予我多方面的帮助。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上报告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历史系的同事们一直慷慨和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意见。工作在这样一个促进个人和学术发展的环境里，每个学者肯定是幸福的。

最后，我向妻子吉尔和孩子乔希、莎拉致以无以言表的感激和问候，否则我的著作将没有任何意义。



救 世

天下古今之事物不外乎理。明此理而内以克治其身心，外以推暨乎民物，不能不由于学理变化而无穷，则学亦精进而不已。隐居以求其志，所求者理也。行义以达其道，道即理也。士人不出户庭而通当世之务，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舍理学其谁。

——陈宏谋，1750 年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y William T. Rowe.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pyright © 200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3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部分 做 人

第一章 家	23
(一) 祖辈	24
(二) 桂林	26
(三) 青年时代	35
(四) 家庭	39
(五) 成年	51
第二章 官	62
(一) 从雍正到乾隆	62
(二) 危机：1733—1737 年广西垦荒事件	76
(三) 更多的逆境	92
(四) 周旋于清廷官场文化	103
(五) 友谊	107
第三章 天	114
(一) 天	115
(二) 超越理性主义	124
(三) 天良：人性的道德实质	130
(四) 人情：人类情感反应的力量和恰当性	136
第四章 学	145

（一）主流学术之外	146
（二）理学传统	153
（三）北方新儒家：吕坤和关学	168
（四）实学	178
（五）经世	183
（六）与湖南的关系	194

第二部分 生 财

第五章 食	205
（一）人口、食品与价格	205
（二）供应	212
（三）粮食进口	218
（四）解决粮食危机	222
（五）流通接济	232
（六）一种可选的经济方式	241
第六章 养	245
（一）民生	246
（二）财产	249
（三）家庭结算（家计）	254
（四）节俭	257
（五）商业	260
（六）利润和私利	265
（七）经济规律	271
（八）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	273
（九）价格	274
（十）私有化	280
第七章 生	285
（一）农业	286
（二）水利	295

(三) 农业技术	306
(四) 采矿业和制造业	321
(五) 发展商业	324
第八章 益	330
(一) 政府粮仓	332
(二) 库存量	341
(三) 每年的粮食回购	345
(四) 支出	351
(五) 社仓	358
(六) 积累和经济增长	372

第三部分 经 世

第九章 人	377
(一) 人之初，性本善（“天良”）	377
(二) 种族	380
(三) 等级制度	383
(四) 富人与穷人	389
(五) 社会角色	398
(六) 家庭	402
(七) 两性	407
(八) 个人	420
第十章 治	424
(一) 良吏与官僚政府	425
(二) 国家应有多大权力？	430
(三) 对官僚机构的管束	435
(四) 对下级官员的管束	439
(五) 县以下的治理	446
(六) 管理	451
(七) 1744—1745 年陕西的“兴除”运动	459

第十一章	公	467
	(一) 国家还是“公众”	468
	(二) 慈善和公共福利	473
	(三) 舆论	480
	(四) 清朝中叶思想和话语中的“社会”	485
	(五) 社会单位：乡	490
	(六) 社会礼仪：乡饮酒礼	493
	(七) 保甲与乡约	500
	(八) 家族自治：陈宏谋 1742 年在江西的试验	507
	(九) 直接与间接的治国之道	521
第十二章	化	524
	(一) 教育	526
	(二) 小学教育	531
	(三) 在边疆的教化使命	538
	(四) 妇女教育	549
	(五) 礼仪	554
	(六) 家庭礼仪	558
	(七) 国家礼仪	567
	(八) 礼、人文教养、文明	571
结 论		576
参考文献		589
译者的话		624

插图目录

图 1 陈宏谋出生地广西临桂县横山村	25
图 2 临桂陈氏部分男性家谱图	46
图 3 两广总督阮元为纪念陈继昌“三元及第”而立的石匾	47
图 4 陈宏谋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家书手迹	77
图 5 年轻的关羽告别父母	127
图 6 岳麓书院	199
图 7、8 18 世纪中国水车的两种类型	301
图 9 陕西省地图	315
图 10、11 在作坊中缫丝和纺纱	319
图 12 织丝绸	320
图 13 苗人勇士猎虎	543
图 14 苗人“女官”	547

导 论

很少有人会质疑 18 世纪中期,大约 1725 年到 1775 年,或者雍正年间和乾隆统治前期,在中国漫长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一直把这段时期赞誉为“盛清”,而中国史学家则称之为“盛世”^①。在这段时期,大清帝国在物质和政治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后来,中国遭受西方的入侵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泛滥。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几代人遭遇到朝代衰落、外来政权的征服和压迫以及为史家称之为 17 世纪“总危机”的影响^②;如果说,乾隆统治后期面临着的一系列新问题,如官僚的衰落、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破坏以及来自国内外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那么,如果以 18 世纪为标准,上述其他时代是无法与之媲美的,因为那个时期事事顺利。

① Frederic Wakeman Jr. 对这一时期有一个经典性论述,参见 Frederic Wakeman Jr.: “High Ch'ing, 1683-839,” 见 James B. Crowley 编: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1-28。要了解近期的中国学术界观点,参见戴逸等:《笔谈 18 世纪中国与世界》,载《清史研究》,1993.1, 1-35;高王凌:《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4, 21-26。Philip A. Kuhn 在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书中非常严谨地提醒我们不应过高估计清朝中期经济繁荣。虽然我同意这样审慎的提醒是合情理的,但我个人认为,至少相对来说,“繁荣”并不是一个对这段历史不恰当的描述。

② 中国通常被看做 17 世纪全球危机的受害者,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气候变冷,农业减产,流行病和因全球贸易缩减带来的白银缺乏。进口银币对盛清商业发展与政府财政至关重要。参见 S. A. M. Adshea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China,” *Asian Profile* 1.2 (October 1973): 271-80; William Atwell: “A Seventeenth-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East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24.4 (1990): 661-82; Frederic Wakeman Jr.,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Late Imperial China* 7.1 (June 1986): 1-26。

那是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蓬勃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国内没有什么动乱。由于疾病和营养不良比过去控制得好，死亡率下降，所以人口得以大增。因为周边的疆土被有效地收回，清帝国的疆域大有扩张。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从内地向边疆地区的扩张以及沿海、沿湖、沿江地区的开垦，内部的扩展也引人注目。农业总产量大幅增长，生产率不断提高，毫无疑问，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人均产量也相应有所增加。同样，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地区间的贸易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规模的大市场。与东南亚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海外贸易也从17世纪的衰退得到恢复，并稳步发展。在贸易稳步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引起新的外交问题。到18世纪中叶，文化和大众教育得到持续发展，印刷、出版业有进一步地发展，以戏剧和小说为代表的艺术日益繁荣。

所有这些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因素肯定发挥了作用。这段时期，统治机构纪律严明，道德规范要求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统治者励精图治。雍正、乾隆统治时期，统治精英内部和整个社会潜在的民族矛盾得到控制。复杂的货币体制也运行良好。国家财政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为政府的财政收支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老百姓的纳税负担不但没有加重，反而有所减轻。尽管人口增长，但大清帝国的水利基础设施（主要用于防洪、灌溉和商业运输）得到有效的维护，而且规模大有增长。在保障粮食供应、平抑粮价、控制地方性饥荒方面，“盛清”时期的统治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对增长的民事诉讼表现出了令人满意的反应，并且提供了解决民众冲突的机制。后来的清朝文人认为这个时代是政治清明的典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陈宏谋堪称盛清时代的缩影，更是了解当时官僚精英心态的一扇窗口，在这方面，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陈宏谋（1696—1771）是18世纪清朝统治精英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从1733到1763年的30年间，他出任12行省，22任官职。陈宏谋是清朝历史上担任巡抚时间最长、调任职次数最多的地方官员。^① 他的任职覆盖了从云南到江南、从甘肃到广

^① R. kent Guy 在完成对清朝巡抚的庞大研究的过程中，友好地给我提供了此条信息。历数陈宏谋的职业生涯，他曾做过扬州知府，天津道台，江苏按察使，云南和江苏的布政使，江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江苏、福建和广东的巡抚，两广总督与代理湖广总督，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等。参见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21. 6136—66，22. 6626—31，22. 7225—33，26. 7641—77。

东的清王朝的大片版图。陈宏谋每到一地，必先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精心治理。清代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方苞（1668—1749）称他是“以仆所见，正人君子居古岳牧之任，惟此时为多”^①。陈宏谋的见识，往往超乎寻常。因此，哪里有危机，他就被皇帝派去处理哪里的难题。陈宏谋虽不是一位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的为政风格与大多数有能力的同僚也没有什么区别，但他那种尽职尽责的精力和投入是令人大为惊讶的。在晚年，他被提升到显赫的东阁大学士（在清代广西籍官员中仅他一人获此殊荣，历史上也只有三人）和太子太傅。^②此后，他身患重病，奏请解职归里。1771年，乾隆皇帝两次拒绝他的辞呈后，赐诗一首：

中外勤宣历久频，遂教黄阁预丝纶。

老成允著恒敷政，……

岂弗惜离留未可，最怜言去恋犹真。^③

陈宏谋的重要历史地位，不在于他的任职时期长，也不在于他工作上的成就，而在于他是清朝地方官员的典范，尤其是被人们称为“经世”治理风格的典范。“经世”通常被译作“statecraft”，但由于在汉语里缺乏一个与英文“state”相对应的概念，“经世”更多地被译为“social management”或“ordering the world”。^④后来史学家认为清朝中期经世学风的复兴与陈宏谋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20年代史学家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可谓经世学的圣经。这部极具影响的巨著收录陈宏谋的文章达53篇之多，仅次

① 方苞给陈宏谋未注明日期的信件，见《方望溪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63—64。

② 谕旨，乾隆32/3，见《先文恭公年谱》12：19。陈于18世纪60年代在北京也曾任几个部的尚书，兼职国史馆副总裁及其他众多工作。他认真地对待这些职责，要了解他在北京繁重的日常公事的细节，参见家书，乾隆29/11/15，30/3/29，30/12/26，32/4/23，见《陈宏谋家书》228—32，237—40，248—49。

③ 谕旨，乾隆36/2，见《列传》，5834，宫中档，台北。

④ 这个短语选自 Robert Hymes 和 Conrad Schirokauer 编著的关于早期中国经世思想的会议论文集的标题，该论文集为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虽然我完全同意他们所偏爱的翻译，但我继续使用“statecraft”这一翻译，因为它言简意赅，广为学界接受。

于顾炎武。近些年来，作为政治信条的“经世”，引起了中国和西方许多学者的关注^①，但“经世”的含义是什么，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意见。本书研究任务之一，就是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学识渊博的学者张灏认为，“经世”的本质就是不再按正统儒家信条（以道德和个人典范为基础）来治理国家，而是偏重于制度和组织的实用操作（在正统儒家看来这种风格与非道德性的法家理念关系密切），偏重于把物质财富和权力当作正当的政治追求。^② 后来中国士大夫称陈宏谋是一位注重实效的、技术型的官员和亲身实践治理国家的先驱。在这方面，他与被约瑟夫·列文森称作“业余型典范”的帝国末期儒家精英们相反。^③ 同时，由于在水利工程、农学、财政管理和军队后勤这些技术领域展示出了很高的技巧，陈宏谋受到了称赞。

陈宏谋的思想世界存在着三重内在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才使陈宏谋成为一位具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一方面，陈宏谋代表了一种脚踏实地和从实际出发的管理风格的技术专家；另一方面，他可以而且一贯被人们视为是一位相当严厉的、有时几乎是纯朴道德准则的真诚和热心的倡导者。这种道德准则是施仁政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陈宏谋在注重文化教育方面的努力成为后来官员们的典范。他所编辑和刊印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和《训俗遗规》等被许多教育家（不论是私立或是公立学校）奉为教材，并延续至今。在从政期间，陈宏谋十分强调引导百姓去参与重塑道德的礼教实践。从陈宏谋的事例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如前所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竟然经常同时存在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理念之中。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显著矛盾，就是本书的目标之一。

另一个相关的内在矛盾，是中央政府及其在地方的代理人一方与地方社会自我管理为另一方之间的权利平衡问题。在孔飞力和闵斗基里程碑式的

① 例如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经世思想研究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84）。

② 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拾遗》，见近代史研究所：《近世中国经世思想》，尤其是16-17；张灏：《新儒学里的经世思想》，载《清史问题》3.1（1974年11月）：尤其是47-48。

③ Joseph R. Levenson, “The Amateur Ideal in Ming and Early Ch’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Painting,” 见其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15-24。

研究中，他们展示了存在于清代及以前的另一种政治理念。这种理念系统地批评了当时的官僚统治，呼吁尽可能地通过那些当地土生土长的经济和文化精英们来管理地方。^① 这种政治观念常被称为“封建”。它被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顾炎武（1613—1682）、魏源（1794—1856，应是1857——译者）、冯桂芬（1809—1874）和“经世”的观念结合起来，因而与后者关系密切。然而，两者之间的实际联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仍然还不太清楚。由于陈宏谋在思想上与这些思想家有某些相同之处（下文将会讨论到），因而将他看做反传统的思想家是引人注意的。的确，有充分证据表明他有兴趣放权于地方精英们，培养地方自我管理机制；他对中央政府在财政及其他方面对地方的过多索取也一贯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有一种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位国家管理政策的制定者，为了使国家控制更高效和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他不断地提出各种技术方案。陈宏谋思想和政策中的这些看起来互为矛盾的方向又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呢？

在陈宏谋的思想和政策中，第三个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在他的思想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超越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等界限，尊重所有人类成员的自主和尊严（这些在某些时候可称之为“平民主义”、“平等主义”或者“民主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唯有等级制度和集权体制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运转。换言之，从陈宏谋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强调个人的价值、需求、愿望，甚至权利；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集体利益优先（个人服从于家庭、家族、地区和国家），强调个人服从于与生俱来的命运（“分”）的必要性。陈宏谋这种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它们为陈宏谋制定实用的社会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思想显得相互矛盾，从我们基于现代社会的经验而

① Philip A.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见 Frederic Wakeman Jr. 和 Carolyn Grant 编: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257—98; Tu-ki Min,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Feudalism in the Ch'ing Period,” 见 Philip A. Kuhn 和 Timothy Brook 编: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9—136。